

本刊简介

读者意见

我要投稿

主编信箱

联系我们

作者名 关键字

搜索>>

2010年 第6期

按期查阅>>

== 专栏查阅 ==

过往期刊

2009年 [more >](#)

• 第一期 • 第二期

2008年 [more >](#)

• 第一期 • 第二期

2007年 [more >](#)

• 第一期 • 第二期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

[\[返回前页\]](#)

深港合作的文化意义

作者/来源：毛少莹

汪洋书记在深圳考察时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加强深港合作。我认为，深港合作不仅是推进深圳国际化进程的突破口，还具有更重要的文化意义。

近代以来，关于中西文化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一直在争论。先是明末清初，随着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争论从是否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开始，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鸦片战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热、21世纪的国学热，争论仍在持续。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将中国文化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①那么，正如袁伟时先生所指出的，这种争论到今天，已经很大程度上水落石出。那就是制度文化层面的争论已经基本终结。^②我们知道，制度文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就制度文化的层面看，经济制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法治、宪政，对人权、物权的保障等核心内容，已经成为了党和政府高度强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容。汪洋书记强调指出，民主法治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是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之，“随着中国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字，随着中国加入WTO，中西文化在制度层面上的争论已经基本终结。”^③当然，争论终结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包袱沉重、国情复杂的国度，如何落实业已形成的“改革共识”，如何建立完善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中西非制度文化层面的争论还在继续，甚至更加深化和激烈。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的新阶段。包括非制度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伴随现代化浪潮而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全面的扩张之势，遍布全球的麦当劳、牛仔裤、好莱坞影片……正在冲击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如果说非制度文化大抵包括了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认同、思维方式、人生目标、审美习惯、艺术品位、风俗习惯等等，那么，在这些领域，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非常之大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适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由于悠久的历史 and 风格几乎完全迥异于西方的文化，长期遭受了深刻而痛苦的文化冲击。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汪洋书记等政府官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向香港学习，促进深港文化合作，努力将深圳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要求。深港合作，其文化意义同时体现在制度和非制度文化两个层面。

正如汪洋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香港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进行了一轮消化，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有机的结合。就制度文化层面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较早建立了以英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香港建立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最自由的贸易区之一。政治领域，香港虽然尚未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香港源自英国典章制度的一整套现代行政管理模式，有效地适应了香港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对公共管理的需求，政治稳定开明，政府高效廉洁。推进深港合作，无疑有助于深圳现代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非制度层面，虽然就一般的文化艺术来讲，香港文化曾经被很多人看不起，但是，以现代化的视角观之，其实香港文化的现代化程度很高，作为一种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具有特殊的价值。香港在英治时期，长期实行“消极不干预”的文化政策，回归后，政府基本上实行的，也只是一种“回应性”的文化政策，包容多元价值，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统一，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大，加之没有“文革”等历史浩劫，文化其实一直处在一种杂交式的自由发展之中。英式教育、殖民背景，一方面培养了大批懂英文，熟悉西方文化的香港人，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时间观念深入人心，而西式餐饮、礼仪、服饰等渗透日常生活。另一方面，香港固有的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岭南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等也长期得以保存，这使得香港文化可以自由地杂糅中西，加之国际化的移民人口结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香港文化更是获得了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香港资讯发达，言论自由，科学理性观念普及，守法、守时，诚信、讲求契约和效率。

总而言之，无论是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层面，香港都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成功结合的地区（台北也可以看作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但情况与香港又有不同）。从现代化的程度，或者说从文化模式、文明模式的角度来看，香港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精英管制（政府）、普通法（英美法）法治、个人主义（市民）和现代企业家精神（工商界）基础上的，中西交融，独具特色的“香港模式”。以所谓“深度现代化”的视角观之，^④香港的现代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

式。

这种模式对深圳乃至全国的发展,无疑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自建特区以来,开拓创新,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勇气,探索出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领跑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未来,深圳如何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等新的时代要求中,扮演好特区的角色,继续领跑中国的现代化,将决定深圳在全国乃至国际城市竞争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个挑战简单讲,就是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成了所谓的第一次现代化(主要是经济领域)之后,如何推动第二次,第三次现代化(主要是政治、文化等领域),这也正是从政府到民间,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倍受关注的所谓“深度现代化”问题。深度现代化包括了众多复杂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建设,思想启蒙的深化,人的现代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等等。无疑,“摸着石头过河”多年之后,大家都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这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能否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目前,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争论的关键是深度现代化的路径、方式和模式。

“香港模式”提供了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参照。深港合作的文化意义,更重要的,体现在推进,引领中国现代化,包括制度层面,也包括非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上。通过深港合作,探索中国深度现代化的路径、方式和模式,将不仅有利于深港城市的发展,也大大有利于中国现代民主法治的建设和中西文化的交融,这正是深港合作最大的文化意义。

由此,才能真正理解汪洋书记讲话中提出的几大要求的内在联系,也才能不负领导们对深圳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的殷切期待。

注释: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卷,第461页。

②③ 袁伟时:《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与意义》,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

④ 陈云:《积极掌握一国两制的文化出路》,香港《信报》2000年12月15日。

(作者: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版权所有:中共深圳市委党校 粤ICP备05016979号